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
陈泽宪、陈霞飞 译

1895—1912
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



1895—1912年
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著

陈泽宪 陈霞飞 译

陈泽宪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895——1912年
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兵书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8印张 234千字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000册

统一书号：11190·007 定价：1.00元

出版前言

本书是研究清末新军的专著。作为问题展开的历史背景，书中回顾了满洲早期的军事制度及其演变；太平军以后中国的军事制度及其演变；特别是太平军以后中国的军事形势。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军事问题，国内还很少有专门的著述。

作者拉尔夫·尔·鲍威尔(Powell Prof. Ralph Lorin)，美国犹他州盐湖人，生于1917年。1934年在加利福尼亚中国学院学习。1946—1947年，曾以一个军事分析员的身份在中国服役。1950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6—1958年在台湾“美国大使馆”任公共事务顾问。1961年以后，任华盛顿美国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远东研究会专业计划主席、美国历史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战略研究协会会员。鲍氏撰写了相当数量有关中国近代和现代军事、政治方面的著作，成为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鲍氏在本书中讲，1946—1947年期间，他发现了“人们关于中国军事潜力的错误概念”。根据手头的材料，我们还弄不清作者当时的“军事分析员”职务，使他有没有或者在多大的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卷入由美国出枪出钱，由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中国内战。但是他所谓“关于中国军事潜力的错误概念”，无非是后来被事实所粉碎了的那些对于国民党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双方力量对比的估计。因此，虽然讲的是清末新军，作者的目的在于为“阐述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特征和影响”，找寻历史的根据。

由于作者的帝国主义立场和他所沿袭的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观点，书中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是错误的甚至是污蔑性的。比如把义和团片面地解释为“排外运动”，而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之役则轻描淡写，以至进行辩解；它不分析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境内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的具体情况和性质，而诬称“中国历史上满是向外扩张和内部战争”等等。对于这些和类似的观点，必须注意分析和批判。

尽管如此，作者在有力的历史事实面前还是得出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当训练、装备和领导良好的时候，中国农民是头等的士兵”；而中国共产党“尽力矫正了中国军队的传统弱点，从而建立了一支有训练的党的军队，能够执行党的意志的军队”。作者的立场、观点，使他不可能对这一事实作出科学的论证，但这个结论本身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此外，本书作者很重视新军编练过程中一些外国教习和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军事视察机构对新军的各种估价。书末所附“书目提要”中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较多，有些是没有公开出版的，这对于“新军”的研究者，也许有一定的用处。

目 录

第一章 1895年以前的中国军队.....	(1)
导言	(1)
满洲军队组织的缘起	(4)
太平军叛乱时期	(14)
权力结构的转换	(26)
被忽视的年代的军事面貌	(29)
中日战争	(38)
第二章 1895—1897年新型军队的建立	(44)
改革的要求	(44)
张之洞和自强军	(52)
北洋军事集团的起源	(62)
有限度的军事改组	(72)
军队的给养问题	(75)
第三章 1898—1900年百日维新与义和团叛乱	(79)
百日维新	(79)
武力政变	(85)
政治上反动而军事上进步	(87)
义和团叛乱前夕的军事实力	(92)
义和团叛乱	(96)
叛乱的军事教训	(103)
不参加战斗的人员	(105)
第四章 1901—1903年慈禧领导下的军事现代化	(115)
满清的维新诏谕	(115)
袁世凯的军事政策	(123)

湖北在军事上的进步	(131)
其他各省的军务	(140)
这一时期的回顾	(145)
第五章 1904—1906年军事和官制的改革	(149)
练兵处	(149)
创设陆军的计划	(154)
练兵处的条陈	(155)
军事学堂的建议	(161)
军衔的改革	(164)
铁良的视察之行	(167)
民族主义与革命	(170)
行政改革与陆军部的建立	(172)
第六章 1904—1906年间军事训练与组织方面的 进步	(179)
袁世凯和北洋军	(179)
权力的斗争	(188)
张之洞的军事政策	(196)
对军务建设的评价	(201)
第七章 旧秩序的崩溃，1907—1911年	(218)
慈禧太后面面对的问题	(218)
改革军政的重提	(221)
派系之争	(225)
一个时代的结束	(228)
醇亲王监国摄政，对于权力的最后争夺	(234)
陆军中的兵变	(240)
荫昌在军事行政上的举措	(244)
危机	(253)
第八章 陆军和1911年的革命	(257)
对军事力量的估价	(257)
支援武装部队的机构	(268)

革命和袁世凯的重掌政权	(276)
共和政权的军事政策	(285)
革命期间的军事活动	(290)
中华民国的成立	(297)
第九章 结论	(305)
书目提要	(310)
中文著作	(310)
外文著作	(312)

第一章

1895年以前的中国军队

导 言

十九世纪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崇尚文治的东方社会，这一传统概念，一直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可是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军阀就起着主导作用。衡量一种政治力量总是首先看支持它的军事力量的大小，也就是说，政治党派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他们所能控制的军队的数量与质量。

1946—1947年期间，我以一个军事分析员的身分在中国服役。当时，我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和人们关于中国军事潜力的错误概念发生了兴趣。在回到学院生活之后，我就决定对于近代中国的西式军队的发展和军人的作用进行一番研究。虽然我的最终目的是阐述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特征和影响，但是我的研究使我深信，在对最近的事件作出正确分析之前，必须了解事件所缘起的背景。

中国近代军阀溯源于19世纪中叶太平军叛乱时期。而军阀主义，则是在中日战争(1894—1895)和辛亥革命期间文治官僚制度的表面统治结构衰颓以后萌芽的。在那些年代里，民国时代的主要军阀不是接受了军事训练，便是获得了军权，使他们在旧秩序崩溃后夺得了政权。从1895年到1912年清帝逊位的这段危急时期，是本书的研究范围。然而，由于缺乏有关从太平军叛乱到1895年这段整个准备时期的综合性著作，

因此，就有必要写一章导言，为以后时期的研究奠定基础。

这本著作的基本目的有二：首先是试图描绘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如何成长起来，以及军阀如何上升到能够在君主制崩溃后夺到政权的地位。上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清朝末期为争夺武装力量而进行的斗争。其次，本书将追述中华帝国陆军现代化的过程，并对它已经取得的成就给以估价。

近百年来，中国领导人在试图增加其军事实力时，遇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这包括工业的落后、贫困、缺乏文化、政治上的地方分权、裙带风盛行、缺少合格的军官和对于改革的抵制等。军队是社会的产物。文明社会的政治、社会组织 and 经济结构同它所发展起来的武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社会特性的根本改革会在军事建设方面有所反映；另一方面，由于内外压力而必须对武装力量进行的改革也能够改变一种文化的其余方面。要维持一个有效率的军队，非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不可，而军队的规模与装备，则最后取决于供养他们的经济能力。同时，军队的社会结构，也能反映出军事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信。如果士兵被看作是社会的渣滓，他们也许就会成为社会的渣滓。由于这些原则都是可以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因此必须给以适当注意。

军队的发展史，就是军队组织与训练制度的发展史。现代军队是由个体技术人员组成的高度复杂的机体，这些个体技术人员象一个球队成员那样的协同动作。各种类型的军事部队的组织形式，是根据理论和在演习与战斗中获得的经验而确定的。部队的组织结构通常决定了部队在战斗中的作用。由于采用新式武器或新式技术，一定会引起组织方面的变革，因此，军队的现有实力，多半也能根据它的结构判断出来。对中华帝国的新式军队来说，也是如此。

十九世纪初期，清朝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它已经处于衰落之中，可是古老的中国当时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帝国，大体上处于同世界其他地区隔绝的状态。中国行政制度的许多特征——事实上也就是它的文化特征——早在公元前即已生根。到了唐宋之际，它们就更为制度化了，因此一直保存下来，其变动之少，至为可惊。而且中国的统治集团并不想真正改动旧的秩序。两千年的历史证明，儒家制度适合于中国。朝代虽几经更迭，但是儒家制度却差不多原封未动地继续存在着。

末期的清帝国是一种地方分权的专制政治，帝国被一种官僚政治所统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文官的地位高于武官。社会结构以家族为中心，其结果是裙带风盛行。等级制度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在理论上或法律上，一般人的晋升的障碍很少。可是，在实际上，社会倾向于分成许多阶层，官僚士大夫占有最高地位。皇帝被认为是上天之子，人类的统治者。只要他的统治还能容忍，他就是天命所归。当他的统治变为一种压迫而不堪忍受时，儒家思想也承认人民有反叛的权利。中国文明范围以外的人都被看做夷人，他们的使节是藩属国家前来进贡的代表。中国人在同其他国家交往时，是不把它们作为独立的平等国家看待的。自然，这样一种政策是为骄傲的、民族主义的、迅速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西方在对华进行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利欲，冲突便成为无法避免的了。

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军队是当时社会的产物。随着满清帝国的巩固，中国面临的不再是强大的外来威胁。这样，军队的主要任务变成了防止内部叛乱和维持地方秩序。由于多年的相对和平，导致了军队的衰退，这些分散领导的军队，

已经证明不能保卫中国边疆，抵御装备优良的敌人。

在下面将要说明，正是由于传统的军队不能粉碎伟大的太平军叛乱，又不能在第一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保卫中国，以抵抗西方军队，才迫使中国在军事结构方面进行改革。事实上，军事制度是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明冲击首先有显著反映的方面。但是，保守势力是如此强大，旧秩序的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中国直到被它以前的小小的徒弟日本打败时，许多官员才认识到进行改革的绝对必要，才掀起了一个激进的改良运动。这样，1895年以后的军事现代化，就仅仅成为一次广泛的但一般是不成功的改良运动的一个方面——虽然它仍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很清楚，这些新式军队的组织结构、技术和装备都借鉴于西方。同时，也可以指出：现代军队，作为真正变革中的中国的产物，是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这类西方思想的影响。当然，它同时又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也并不奇怪。

中国各类军队的名称甚为混乱。这个时期中国军队名称的改换，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因此，我曾作了一番努力，来弄清中国军队的专门名称，如有可能，便把中国军事组织的名称，译成在规模与特点方面和它最为接近的现代军队所使用的名称。

我希望这本书不仅对研究军务的人有所帮助，同时也能对那些对近代中国感兴趣，因而必须同在中国历史中出现的军事首领及其军队发生关系的人有所裨益。

满洲军队组织的缘起

1644年，善战的满族从他们的故土满洲攻入帝都，进入

北京之后，统治中国达两个半世纪，这就是大清朝。这次满族入侵是两千多年以来，许多“野蛮”部落趁中国内部虚弱，累次入侵边境中最为成功的一次。满洲人在六十年内，从一个小小的边境部落扩展到足以征服伟大中华帝国的国家。在两代的时间内，能干的领导人跨过了满洲，征服了朝鲜，取得了对内蒙古的宗主权。(译注一)满清这次入侵的胜利和长期统治中国的成就，并不都是单靠武力取得的。他们还同时采用了中国人惯用的行政管理技术，外交和政治手段。但是，如果不是首先缔造了一支出色的武装力量，即使是在中国衰退的期间，要征服中国也是不可能的。

满族是一个历经百战的骁勇民族，擅长于军事。其社会结构也具有军事性质，满人和辅助他们的人均被编入通称为旗的组织中。旗在满族的国家中不单是军事组织，它还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职能。不仅是士兵，就是士兵的家属，也和士兵一样被编入旗中。^①

旗的制度的缔造者是天才的军人政治家，清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这位能干的领导者认为建立强国的先决条件是建立一个有效率而能起作用的军事机器。1601年，他把随从人等分别编入牛录(译注二)，以后称佐领，置于黄、白、红、蓝四旗之下。这种新型组织以旗色定名。1615年时已经有二百个满人牛录。后又划成八个单位，于是，增加了一种以原有四色的旗帜镶边的旗帜。蒙古及中国本土被征服以后，满人又把蒙、汉这两个民族的降兵组织成旗。1626年成立了蒙古

^① 恒慕义编《1644—1912年清朝名人传略》(A.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1943年华盛顿版, 第1卷, 1—3页, 595—596页; 迈可《满清统治中国的起源》(Franz Michael,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1942年巴尔的摩版, 64—66页, 105—106页。

武装，1635年这一支武装扩大到八旗。1637年又成立了两个汉军的旗，这些也在1643年扩充为八旗。因此，八旗事实上包括二十四旗，满、蒙、汉兵各八旗。^①旗兵大部分是骑马的射手，他们成为工业化以前一支驍悍的军队。满洲的力量虽然足以在亚洲建立一个大帝，但是在技术上同欧洲军队比，还是处于劣势。随后，旗人成为国家中享有特殊权的世袭阶级，在昔日彪炳的武功面前，业已成为停滞的标记。

占领了北京以后，旗的部队便以占领军的身分被分配到满清帝国的各个角落。其任务是使人数远居于劣势的满族能够维持其统治地位。^②自然，最重的兵力都驻屯于北京以及拱卫北京周围直隶境内的二十五个城市。其余的旗兵则分扎在许多省份驻防。满族故土境内也留有强大的防守部队。中国西部和西北部经常发生事故的边疆，都有劲旅防守。在中国本部驻防的旗营，则以递次扩大的三重半圆形防线，从北京向南、向西一直远远伸张到广州和四川的省会成都。只有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没有旗兵驻守。除云南和贵州外，每一驻有总督的地方均驻有官阶较总督为高的将军。研究一下地图就可以看出，八旗的首要任务不是对付外来侵略，而是镇慑帝国内部的叛乱。在关内，旗兵多驻防于具有战略意义、人口集中、农业发达、商业繁盛和交通方

① 房兆楹：《计算清初军队人数的一种技术》。《哈佛亚细亚研究学报》(Fang Chao Ying, "A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the Numerical Strength of the Early Manchu Military Forc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13卷(1950年6月号)192—193页；见第5页注①恒慕义编同书第1卷，596页。

② 见威妥玛：《中华帝国的陆军》，这是根据中国文件对八旗的组织、分布、官阶、俸饷与地位的广泛分析；原载《澳门月刊》(T.F. Wade, "The Army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20卷，1851年，第5，6，7月号，250—280页，300—340页，363—422页。

便的地区，诸如大运河的枢纽和长江流域地区、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及华北平原等地，都有驻军。^①

在这方面有兴趣的军事分析家都感到遗憾的是，除估计数字外，缺少有关清朝和中华民国军队实力的可靠资料。根据中国学者房兆楹的说法，1644年时满清总共有五百六十三个牛录。每一牛录在当时有适龄士兵三百人。总计潜在的兵力约为十六万八千人。而通常的做法是，每三个人中只挑一人来服现役。1601年到1735年，满、蒙、汉三支旗兵的牛录数目逐渐增加，但是三个之间的增加速度并不平衡，到了1735年间，北京的京营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个牛录。由于常备军的实力与组织起来的牛录数目是成正比的，进行大战役时，便另组新的单位。1735年以后对旗兵的需要减少了，因此，旗兵数目直到1912年是相对稳定的。^② 据估计，1825年领官俸的官佐最少有一万零六百二十九人（按1812年的数字计算），未入流的员弁和士兵共二十三万六千零十四人，额外人员四万一千四百二十二，工匠与随军商人五千三百二十七人。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数字并不包括所有的旗人。因为，除上三旗以外，国家对不参与军务和民政的人，是不供养的。^③

清朝的第二支主要正规军是绿营。满清统治的早期，他们就决定建立一支汉人辅助武装来协助维持各省秩序。这个入侵者征服中国的时候，一些中国军队替他们出力作战。某

① 参见谢宝潮：《1644—1911年的中国政府》（Hsieh Pao Cha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1644—1911]），1925年巴尔的摩尔版，64—65页；解宝贲：《曾国藩与太平军叛变》（W. J. Hail, *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1927年纽黑文版，3—4页。

② 见第6页注①房兆楹文，193—194页、202页、204页、208页。

③ 见第6页注②威妥玛文，252页、254页；注解宝贲文，3页。以同一资料而对军官的总数提供了一个不正确的数字（一万零五百九十一人）。

些降兵被吸收到八旗中，剩下的便组成绿营的核心。不足之数，以明朝军队、自愿兵和地方团队补充。这支武装的军官，有满人也有汉人，而士兵则都是从汉人中招募来的。绿营与世袭的旗兵不同，它实行自愿入伍制。但它和旗兵一样都受先前明朝作风的影响。^①

绿营组成之后，分为陆路与水师，由骑兵、步兵、守兵组成。这支军队最大的特点是分成许多小单位而遍布全中国。其中大多数，至少在名义上受提督辖治。而另一部分则拨充总督与巡抚作为标兵。提督节制的军队分为镇标与协标和营，每营又进一步划分为一些更小的单位。^②

清朝初期，绿营兵力还不固定。康熙帝时(1662—1722)编制人数约为五十九万人。绿营在全国各处的分布状况虽远比八旗正规，不过，在没有八旗驻防的西北、华南沿海和云南等地，绿营却异常集中。1764年，绿营至少在纸面上增加到六十三万人左右。最明显的发展是它进驻贵州。到1785年，兵力核减为五十九万人左右。1812年，又增加到近六十六万人。后来，道光帝(1821—1850)降旨减少绿营人数，绿营组织也经过一番淘汰。^③1825年，兵力业已减为六十一万八千

① 《清史稿·兵志》二，1页；见6页注②威妥玛文，392页；见7页注①解宝贻文，8页；迈可：《太平军叛乱期间中国的军事组织和权力机构》，《太平洋历史评论》(Franz Michael,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第18卷(1949年11月)，471页，在威妥玛文(见第6页注②)362—416页处，对绿营组织、官阶、任务及俸饷有详尽叙述。

② 梅辉立：《中国政府》(W.F.May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第3版，约于1896年在上海出版)，64—65页；波罗纳脱和哈格尔斯脱罗姆：《中国目前的政治组织》(H.S.Brunnert and V.V.Hagelstrom, *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1912年上海版，337—341页。

③ 《清史稿·兵志》二，19—20页列有上述年代的兵员总额，但各项数字如果分开计算，与总数均有出入。假定各省的分别数字是正确的话，则总数应为：康熙时期五十八万八千一百七十四人，而非五十九万四千四百一十四人；1785年为五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四人，而非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一十四人。罗尔纲：《湘军新志》，1938年上海版，第1页称绿营在康熙时期额兵为六十四万人。

人左右。^①在1851年太平军叛乱爆发前夕，绿营兵力可能曾进一步缩减到五十八万五千人左右。^②

绿营兵力间歇性的增长，与当时军事上的对外政策和大规模内战有关。1785年的人数下降，发生在乾隆帝的主要战役结束之后；1812年的上升，则同苗族和白莲教叛乱有关。道光年代（1821—1850）实行紧缩，外交政策又软弱无力，再加上军队中的腐败，绿营的实力便不断衰退。

就绿营被划分为一大帮独立或半独立的小单位这件事来看，绿营显然只是一支大型的警备队伍，而不是战斗的力量。它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同时对边境上的部落和内地的苗瑶，执行绥靖职责。此外，它还有防范犯罪活动，解运金、银、钱粮、囚犯，运送邮件等任务。它在全国各地虽然都设有哨所，但是由于过于分散，很难在发生大规模内乱和外族入侵时迅速动员起来。由于这种小部队对于地方官吏很有用，任何集中较大兵力的企图都会受到阻挠。因为，这些小部队一调走，地方当局就失去必要的警卫力量。^③

满族开始统治时，对军队采取了相当程度的集中管理。当八旗在满洲开创时，皇上仅亲率一旗，其余七旗以亲王为旗主。1651年，顺治帝有计划地削弱皇族的权力，以增加天子的权力。于是，由天子自将三旗，是为上三旗。到雍正帝时（1723—1735），又褫夺了分属亲王的下五旗，并指定亲信掌握。绿营也基本上由中枢主要是由兵部管辖。而更重要的

① 见第6页注②威妥玛文255页。

② 《清史稿·兵志》二，20页。

③ 见第6页注②威妥玛文，363—364页；第7页注①解宝贲文，10—11页；欧本登少将：《亚洲和欧洲的军队》（*Maj.Gen.Emory Upton, The Armies of Asia and Europe*），1878年纽约版，第18页。